

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傳播問題的再考察

關雪玲
北京故宮博物院
宮廷部

提 要

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達到了高潮，出現了中國醫學史上所謂的「第一次西洋醫學傳入時期」。這一時期，無論是供職宮中的西洋醫生人數，還是傳入清宮的西洋藥物數量，都是其他朝代無法望其項背的。本文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進行考察：

首先，通過對清宮西洋藥物的來源、收貯和使用的探討，可以清晰地看出，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主要是以康熙皇帝為中心來進行的，康熙帝由西洋藥物的受益者，變為宣導者，康熙帝的個人意志和需求有力地影響著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

其次，太醫院御醫和西洋醫生時常奉命共同診視疾病。在診視過程中，雙方懾於皇帝的權威，彼此調整相處之道，達到一種表面的平衡。然而，各自不同的醫學理念、診斷方式、治療手段，決定了不同醫學體系間在更為本質、更高層次上的交流無法實現。

關鍵詞：康熙帝、西洋藥物、西洋醫生

前言

幾年前，筆者曾撰寫〈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一文，從診視疾病、製造藥物、傳授西洋醫學知識三個方面，探究了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問題。文章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刊發後，近年又不斷收集到新的資料，覺得有一些問題仍有深入考察的必要。適逢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筆者得以繼續就前一篇論文中沒有涉及到的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傳播的幾個問題，如西洋藥物¹的來源、收貯和使用情況、太醫院御醫與西洋大夫共同診視疾病作闡發。

一、清宮西洋藥物的來源

（一）外國使團或組織饋贈

十五、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闢了歐洲人的海權新時代，世界整體化的序幕由此拉開。為了追逐商業利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相繼東來，與古老的中華帝國發生直接的政治、經濟聯繫。他們在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時，被納入朝貢體系，以朝貢者的姿態出現，否則有可能被拒之門外。西洋藥物作為他們進貢方物²中的一類，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宮中。這裡僅以荷蘭和葡萄牙為例來說明。

清朝建立後，已經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為頭號海上強國的荷蘭一直謀求開拓對華貿易市場。荷蘭在清朝前期與中國政府的交往頗為頻繁，就康熙時期而言，荷蘭先後在康熙二年（1663）、康熙六年（1667）、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二十五年（1686）向中國派遣使團。且看康熙六年和二十五年使團所攜帶的禮品。

康熙六年，荷蘭巴達維亞總督派遣使臣范·胡恩（Peter Van Hoorn）來華，意欲延續和發展已經得到清廷許可的對華自由貿易。使團以國王名義進呈的方物有：

-
- 1 本文中的西洋藥物，指的是由西洋人攜帶來華的藥品或具有藥用價值的物品，這些藥物並非都產自西洋。
 - 2 在外國使團饋贈的方物中有一些香料，如丁香、肉荳蔻、檀香、沉香、桂皮等；以及從香料中提取的油露，如丁香油、檀香油、冰片油等。外國使團為什麼選擇這些方物作為禮品，其中是否考慮到它們的藥用價值，我們現在無從知曉。但從這些香料進到清宮後的使用情況看，這些香料和油露除配香外，同時也作為藥品使用。這點從北京故宮博物院藥具藥材庫中現存的一些清宮遺存的藥材賬簿中可得到證實，試舉兩例。例一：清宮遺存的《橘紅茯苓等底賬》中把沉香、桂皮和橘紅、茯苓、合歡花等藥品登錄在一起，其作為藥品的事實顯而易見。例二：一件清宮認看藥物的黃簽上寫有：「丁香油，溫胃祛寒，治寒濕作瀉。檀香油，開胃醒脾，治諸種氣痛。冰片油，辛香解毒，治外科諸瘡。」

丁香、鞍轡具、刀劍、哆囉呢絨等。以使臣范·胡恩個人名義進呈方物有：薔薇露二十罐、槍支等。³

清朝統一臺灣，開放海禁後，康熙二十五年，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又一次向中國派出使團，使臣賓先吧芝（Vincent Paats）攜帶禮品中有：丁香三十石、檀香二十石、冰片三十二斤、肉荳蔻四甕，以及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皮油各一罐。⁴

清初沿襲明末的政策，允許葡萄牙人繼續租住澳門，但因海禁甚嚴，澳門與內地的貿易嚴重受阻。為了紓解澳門的困境，葡萄牙印度總督以國王阿豐肅六世（Alfonso VI）的名義派遣使臣瑪訥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向清廷奉表入貢。康熙九年（1670）七月，瑪訥撒爾達聶抵京，饋贈給清廷的禮物中有伽枌〔南〕香、象牙、乳香、蘇合油、丁香、犀角等。⁵伽南香，又名「沉香」，是著名的香藥，清宮常用來配錠子藥。乳香可制薰香，又用作治慢性氣管炎和外用膏藥的混合液。丁香，具有溫中降逆，溫腎助陽的功能。犀角是珍貴的藥材，有清熱、解毒之功效。

澳門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住澳葡人在貿易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生存手段。為了保障貿易的順暢，除了國王派出的外交使團外，住澳葡人時常以感謝朝廷在貿易方面提供便利為由，通過兩廣總督向康熙帝（1654-1722，1662-1722 在位）轉呈土物。如，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九日（1719 年 2 月 27 日），兩廣總督楊琳（1716-1724 在任）具摺轉呈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唆嚟哆（Procurador do Senado）等人之意：「哆等住居澳門，世受皇上恩典，澤及遠夷，貿易資生，俾男婦萬有餘口得以養活。聖恩高厚無可報答，敬備土物十六種，伏乞代進，稍盡微誠。」十六種土物中有藥物：檳榔膏六罐、水安息香共二十個、保心石大小共二十個、珊瑚珠二串、鼻煙十二罐。⁶

幾天後，亦即 1719 年 3 月 1 日（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一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羅薩（Manoel Vicente Rosa）等又呈交楊琳一封信。信中提到清政府實施禁止商民到南洋貿易的禁令，但澳門葡人不在禁令之列。為表示謝意，特備薄禮一份，懇

3 崑岡等編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三，頁 4-5。

4 崑岡等編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三，頁 6-7。

5 崑岡等編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三，頁 5。

6 〈兩廣總督楊琳奏為代進住澳門洋人所備土物事摺〉，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 8，頁 383。

請轉獻康熙帝。信中附有一張禮單，從中可以辨識出藥物有：秘魯金雞納皮一箱，極好之膏藥、止痛藥等一箱，吐根製劑一錫箱。⁷

(二) 官員進獻

康熙時期，由於皇帝的喜好，西洋藥物成為官員爭相進獻的新事物，國人似乎也不再忌諱以藥物作禮品。

康熙六旬大壽時，原任經筵講官、戶部侍郎王鴻緒（1645-1723）所貢獻之物與眾不同。不僅宋版古籍、元明兩朝名人繪畫、官窯瓷器等珍品一應俱全，還有多種西洋藥物，如：流黃露一瓶、鼻煙二瓶、羅斯瑪里諾露四瓶、保心石一塊、巴爾撒木油二盒、古巴依巴油四瓶、德里亞格⁸二匣、巴爾撒木香珠十掛、葡萄酒六瓶。⁹

一些省份，如廣東、江西等地的封疆大臣，利用其屬地的地利之便，比較容易尋覓到西洋藥物。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份來自開港口岸廣州的進單上便有：保心石六個、巴爾撒木香一匣、荳蔻油一匣、檀香油六罐、得利啞咖二瓶、丁香油二瓶、巴爾撒木油二瓶、鼻煙六瓶¹⁰、避風巴爾撒木六罐。¹¹

江西是早期從澳門、廣州到北京的必經之路，近代以前江西所具有的這種通道優勢，使得江西的地方官員採集西方物品也相對便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一件江西巡撫郎廷極（1663-1715）奏呈茶葉及各類物品摺，這件無年月奏摺中開列了郎廷極進貢的物品，其中有西洋藥物：番紅花一瓶、金雞納一匣、安的莫牛一匣、的莫油一瓶、各巴衣巴油一瓶、葛爾敏油二瓶、避風巴爾撒木二盒、西洋辟雷石一件等。康熙皇帝在奏摺上有多處批答。把「安的莫牛」中的「安」字硃筆圈出，改為「昂」字。在「葛爾敏油」之「油」字前朱筆加「的那」二字。而對於所

7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頁94。

8 西洋藥名的漢字寫法均是由西文翻譯而來，所以在不同的檔案、史乘、私人筆記、論著中的寫法是不一致的。以德里亞格（teriaga）為例，僅本文徵引的文獻和檔案中就有德力雅噶、德里雅嘎、德里鴉噶、德利啞咖、德利雅噶、德利亞噶、德哩啞嘎、得利雅噶、底野迦幾種寫法。對此在引用時不作統一，仍保持原貌。其他藥品名稱也同樣處理。

9 王原祁等纂修，《萬壽盛典初集》，卷五十九，頁7a-8a(83-84)。

10 康熙時期，國人對鼻煙的藥用價值有各自的認識。一種是：「可明目，尤有避疫之功。」另一種是：「可以驅寒冷，治頭眩，開鼻塞。」分別見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七，頁131；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三，頁117。

11 北京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合編，《清代廣東貢品》，頁10-11。

謂的「避雷石」，康熙皇帝指出：「非避雷石，是止血石，不甚佳，不能止血。」¹²

康熙六十一年萬壽節時，江西巡撫王企靖所進獻之物品是另一典型例子。這些域外所產的物品，因「其名甚異」而被蕭爽收錄在《永憲錄》中：

羅紋紙二十張，格爾莫斯一瓶、歌爾德濟德辣一瓶、德哩啞嘎一瓶、巴木撒木香避鳳巴爾沙摩一瓶、番紅花一瓶、巴爾白露一瓶、啞掛濟拿摩摩三瓶、金濟納一包、衣巴油二瓶、安利摩牛一包、蘇濟尼二瓶、甘佛蠟一座、巴爾加德哩一瓶、阿都爾則一瓶、西洋斑毛一匣、波囉額德一瓶、色路撒一包、沙璜香一瓶、達爾默的歌一瓶、翁文多哩歌一瓶、武瑪武一包、撒勒步路蠟一瓶、西洋琉璜一包、蘇爾佛助一瓶、啞掛辣喜納一瓶、白辣濟多露我樂二瓶。¹³

後來，吳振棫（1790-1870）又把上述內容移錄在《養吉齋叢錄》中。需要說明的是，移錄時出現了訛誤。一些物品名稱中用了異體字，比如，波囉額德，寫作波「羅」額德；西洋琉璜，寫作西洋「硫磺」；白辣濟多露我樂，寫作白「蠟」濟多露我樂。較為嚴重的是，金濟納的量詞使用和衣巴油名稱均與《永憲錄》不符。《養吉齋叢錄》中所謂的「金濟納一瓶、包衣巴爾二瓶」，實際上，應為「金濟納一包、衣巴油二瓶」。

這份貢單中的物品，大多數名稱奇異，究竟是些什麼東西，現在仍莫辨其詳。但綜合清代各種文獻和檔案，還是能確定其中有幾種是西洋藥。如：格爾莫斯、德哩啞嘎、巴木撒木香避鳳巴爾沙摩、番紅花、金濟納、衣巴油、安利摩牛、西洋琉璜。

（三）傳教士進呈

宮中西洋藥物還有一些是西洋傳教士所呈進。無論是在京城的，還是散居各省的傳教士，大都攜帶有藥物。這些藥物一來是自用，以防不時之需。二來是給官員或民眾療疾之用。第三、作為禮品進呈給皇帝。康熙帝初次會見傳教士時，傳教士通常都準備有見面禮。羅馬教廷傳信部的三名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德里格（Teodoricus Pedrini, 1670-1746）、山遙瞻（Guillaume Bonjour-Favre,

12 〈江西巡撫郎廷極奏呈茶葉及各類物品摺〉，無年月，《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8，頁1118-1119。

13 蕭爽，《永憲錄》，卷一，頁18。

1669-1714) 在首次見康熙時，自備了三十件禮品，其中有藥物、補酒和蜜錢等。¹⁴

逢重大節日，傳教士也和文武百官一樣，進獻禮品。《萬壽盛典初集》中便有這方面的記載。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康熙帝六旬大壽，紀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蘇霖（Joseph Suarez, 1656-1736）、白進（晉）、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等進：

算法運軸一匣、大規矩一箇、小規矩一套、葡萄酒一箱、鼻煙二瓶、玫瑰醬一瓶、木瓜膏八碗、香餅一匣、保心石數箇、巴斯弟略一瓶（如糖果味美）、糖果一瓶、撒礪一匣（如胰洗垢）、金幾那兩包。¹⁵

這些禮物中藥品或具有藥用價值的有：鼻煙、木瓜膏、保心石、巴斯弟略（pastilha）、撒礪、金幾那。這些禮品按種類統計是十三種，按件數統計則莫衷一是。因為保心石數量不詳，小規矩一套裡究竟包括多少件也不得而知。

當時在宮中供職的馬國賢在《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中，留下了傳教士為祝賀康熙六旬大壽而進貢禮物的情形：

我們歐洲人各自都貢獻了自己的一份禮物。給陛下的禮物包括了歐洲葡萄酒，巴西煙葉，都是在中國最為稀罕的東西。還有一磅蘇合香脂，一匹最好的亞麻布，兩塊高洛曼德爾的印花被面，幾塊飾有白色花邊的手帕，四個刺繡荷包，各種各樣的剪刀、刀子和鎖，三磅酒石，數學儀器，兩瓶香脂，六瓶蜜錢，十二壇醃過的榲桲，八英石的藏紅花、樹皮、油和藥材根。¹⁶

當負責接收禮物的官員們看到傳教士的禮物後，並沒有收下。他們建議傳教士去掉藥物，並把禮物總數減至雙數。官員們宣稱，在壽辰之日給皇上送單數禮品或者藥物都是不祥之兆。傳教士把禮品帶回去後，展開了討論。大家提出了兩個方案，或是任何禮物都不送，或是撤下藥物並把總數湊成雙數。最後大多數人的意見是，為了不冒犯皇帝，送禮還是權宜之計。由於馬國賢所屬的羅馬教廷傳信部的人數較少，導致其在這場討論中失去話語權，馬國賢無奈地退了出來，由耶穌會士來決定如何取捨。結果耶穌會士去掉了藥物，且把禮品總數減至偶數。康熙帝從禮物

14 馬國賢（Matteo Ripa）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頁 48-49。

15 王原祁等纂修，《萬壽盛典初集》，卷五十六，頁 13b-14a(51-52)。

16 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 73。

中挑了十三件，其餘交還傳教士。¹⁷

仔細對照《回憶錄》中眾傳教士準備的禮物和《萬壽盛典初集》中所記載的紀理安、蘇霖、巴多明等所進禮物，不禁眼前一亮，首先是禮品數量。馬國賢說康熙皇帝從禮物中挑了十三件。而《萬壽盛典初集》中所列的傳教士進獻的禮物是十三種。其次，《萬壽盛典初集》中的禮物，在馬國賢的禮物中都可以找到對應。只是同一物品在中文和西文裡名稱不同，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並不知其在中文裡或特定環境裡有約定俗成的名稱，致使我們一時如墜雲霧。《萬壽盛典初集》中所記的算法運軸其實就是《回憶錄》中所寫的數學儀器。大規矩、小規矩是清宮中對各種各樣的剪刀、刀子等小型文具、化妝用具的統稱。金幾那無疑就是以樹皮入藥的一种植物藥。兩種記載的高度契合，讓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它們是不同視野下對同一件事的記述。只不過，《萬壽盛典初集》著重載錄貢品名稱、種類，而《回憶錄》的筆觸則注重於進貢禮品過程中的細節。

至於馬國賢為何說耶穌會士去掉了藥物，而《萬壽盛典初集》中卻有藥物木瓜膏、保心石、巴斯弟略、撒礪、金雞納、鼻煙等。這點不難理解，正如馬國賢所講，不同修會之間的不睦致使他退出了，由親歷者變成局外人，對後來發生事情的描述與事實不符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禮物數量十三種或十三件的問題可以有這樣的解讀：從清宮遺存的文物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進呈的禮物通常都是盛放在包裝盒（箱）內，一盒（箱）內裝一件或數件的情況都有。如果按照外包裝盒（箱）來統計，《萬壽盛典初集》和《回憶錄》中所統計的確實都是十三件。只不過為恭紀萬壽聖典之詳明而編纂的《萬壽盛典初集》中進一步描述了每盒（箱）內禮品件數；相反，因馬國賢的退出，《回憶錄》中對每盒（箱）內禮品件數也就難盡其詳。

提及傳教士進獻藥物，耶穌會在遠東的傳教基地澳門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是不容忽視的，學院內所設的藥房和診所對西方醫學傳入內地作出了巨大貢獻。¹⁸ 葡萄牙阿儒達王室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Palácio Nacional da Ajuda）所藏史料證明，聖保祿學院曾多次向康熙皇帝進獻西藥：

1714 年，康熙皇帝結婚五十周年，北京舉行了隆重慶祝活動，澳門也參與慶賀，由議事會負責籌備禮品送往北京。聖保祿學院的耶穌會士們給皇帝送的禮物是一個大藥盒，裏面裝有多種西藥，如 almácega、gálbano、

17 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 73。

18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頁 140。

opopon-ax¹⁹ 等。……1717 年，聖保祿學院再次進呈新藥物給康熙皇帝。²⁰

董少新先生的《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一書中，以寫於 1714 年 11 月 18 日的一份西文禮單為據，列舉了 1714 年聖保祿學院向康熙皇帝進獻藥物的事例：

1714 年，為了慶祝康熙六十大壽，澳門議事會不僅燃放禮炮，還準備了豐厚的進貢禮品。在北京耶穌會士的示意下，聖保祿學院也不甘落後，同樣備齊了禮品。這些禮品中，各種西洋藥物占很大部分。……根據進貢的禮單，這些藥物包括治療燒傷的藥片一盒，煙草二盒共 12 瓶，上乘歐洲酒六箱，每箱 12 瓶，保心石兩份共 12 盎司，上乘彌撒用酒六箱，每箱 12 瓶，金雞納二阿拉忒爾（arrástel）半，底野迦解毒劑（teriaga magna otomana）二阿拉忒爾，還有各種吐根、阿魏、樹脂等製劑及各種藥膏、糖漿，等等。²¹

至於皇帝接到禮單後的反應以及傳教士對這些藥物的希冀，當時在北京的紀理安和蘇霖在 1715 年 2 月 14 日的回信中寫道：「（康熙皇帝）在看了賀信和禮單後，馬上表現出了滿意，當場便稱讚了底野迦、保心石、葡萄酒和煙草等的神奇效果。因此，對你們的正確挑選，我們表示祝賀。我們也以上帝的名義希望，這些禮物不但作為對過去所受恩惠的感謝，也可以為未來帶來好處。」²²

仔細研讀董先生的論述，發現其中有值得商榷之處。他提到，1714 年聖保祿學院進貢禮品是為了慶賀康熙皇帝六十大壽。而事實上，康熙皇帝六十大壽在 1713 年 4 月 22 日，也就是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且不說禮品由澳門運送到北京尚需時日，僅就禮單書寫日期 1714 年 11 月 18 日而言，此時距康熙皇帝六旬大壽已過去一年半有餘，再以慶賀六十大壽的名義進獻禮品顯然有悖常理。由於無法看到原始資料，對此次進獻禮品的真正名目不敢遽下斷語。儘管如此，聖保祿學院向皇帝進獻藥物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

19 李向玉先生的論著中未給出這些西藥的漢譯名。目前，筆者對此同樣未盡其詳。鑒於此，仍照舊移錄其西文名，以供同好辨識。

20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頁 140-141。

21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114。

22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114-115。

(四) 清廷向西洋人索取

除以上幾種途徑外，史料中有清廷主動向西洋人索取西洋藥的記載。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康熙帝授意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向羅馬教廷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Tournon, 1668-1710）索取西洋藥。康熙皇帝聖旨曰：「多羅所攜得利雅噶有餘，赫世亨爾向伊求取，若少則勿取，可稍信到廣東後尋得寄來。若有綽科拉亦求取。」多羅留下足夠自用的得利雅噶和綽科拉後，把剩餘的得利雅噶兩小錫盒，毛重四兩五錢，綽科拉一百五十塊，悉數交給赫世亨。並表示到廣州後，尋覓到得利雅噶，再送給赫世亨。²³

兩年半後，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以十八阿哥薨逝和廢黜太子這兩件意外之變為直接誘因，從而致使康熙帝日增鬱結，心神耗損，併發了嚴重的心悸症，即所謂的「朕體漸弱，心跳加增甚重」。²⁴值此非常時期，武英殿監造、員外郎張常住向廣東督撫傳旨：

著尋西洋格而墨斯，²⁵著實要緊，得了，急速著臺報上送來。再著西洋人寫信，臺報上帶去與廣東眾西洋人，有格而墨斯，著臺報上送來；如無，將阿爾格而墨斯速速送來，欽此。外，又藥樣壹包，張常住付來與廣東西洋人字壹封。²⁶

接旨後，兩廣總督趙弘燦（1707-1716 在任）即星夜差人前往廣州、澳門尋找。幾日後，西洋人送到：

上寫格而墨斯子壹包，錫盒第壹盒；格而墨斯藥壹件，瓷碗貯第貳盒；格而墨斯藥壹件，錫小花盒貳盒樣，壹件小磁盃（瓷杯）；格而墨斯製成的藥，第壹盒樣壹件。又格而墨斯子壹封。²⁷

趙弘燦把西洋人交來的各種藥和宮裡發過去的藥樣收貯在同一容器中，差家人

23 〈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奏報向洋人索取西洋藥摺〉，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418。

24 〈川陝總督齊世武等奏為盼望聖躬康復摺〉，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609。

25 格而墨斯和阿爾格而墨斯在不同中文文獻和檔案中寫法各異。僅就本文引用的文獻和檔案而言，格而墨斯又寫作：格爾默斯、格爾莫斯；阿爾格而墨斯分別寫作：哈爾各斯默、亞爾格墨斯、阿爾各爾莫斯。對此，引用時不作統一。

26 〈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為遵旨恭進西洋藥格爾墨斯摺〉，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彙編》，冊 2，頁 299-300。

27 〈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為遵旨恭進西洋藥格爾墨斯摺〉，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彙編》，冊 2，頁 300。

火速送進宮中。並表示當下仍在多方尋覓，再有所得會另行恭進。趙弘燦的行為頗合康熙皇帝心意，他在奏摺摺尾批諭：「已（以）後有此等事照此摺好。」²⁸

讀完奏摺後有一個強烈感覺，之前康熙和趙弘燦已經就阿爾格而墨斯有過溝通，康熙帝知道對趙弘燦而言，阿爾格而墨斯唾手可得，或者甚至趙弘燦處當時就有。所以才有找不到格而墨斯時，速將阿爾格而墨斯送來的指令。而對於格而墨斯，趙弘燦顯然是陌生的，為了保證所尋覓藥物的萬無一失，特意讓趙弘燦家人帶回一包可資參照的藥樣。

對阿爾格而墨斯的功效，清宮檔案有明確記載：「系治心跳用，此內有麝香，其味平常上用不得。」²⁹《欽命傳教約述》中的記載可進一步佐證阿爾格而墨斯的功效：「江寧林老爺進呈葡萄酒，³⁰廣東穆老爺進呈亞爾格墨斯，皇上大喜，俱令受，因聖躬康泰，用此兩物耳。」³¹林老爺、穆老爺分別指的是傳教士林安和穆德我，他們進呈禮品之事發生在康熙四十八年，所以「聖躬康泰」無疑指的就是康熙帝擺脫心悸症的困擾。而對於格而墨斯，目前在中文文獻、檔案中均不見記載。只從傳給趙弘燦的諭旨：「如無（格而墨斯），將阿爾格而墨斯速速送來」看出，格而墨斯和阿爾格而墨斯是兩種可以互為替代的西洋藥。換言之，兩種藥有相同的功效。

以上是基於文獻、檔案對阿爾格而墨斯和格而墨斯所作的闡述。董少新先生認為，格爾（而，下同）墨斯和阿爾格爾（而，下同）墨斯分別是葡文 *quermes* 和 *alquermes* 的中譯名。格爾墨斯意為胭脂蟲，是一種生活在櫟樹上色如紅胭脂的小蟲。阿爾格爾墨斯意為胭脂紅酒，即用胭脂蟲炮製的一種藥劑。³²此觀點中，除對格爾墨斯和阿爾格爾墨斯作了釋義外，又提到另一種西藥胭脂紅酒。並對這三種藥物之間的關係作出了界定：第一，在藥物學語境中，格爾墨斯是動物類藥材，阿爾格爾墨斯是用格爾墨斯配製的成藥。第二，阿爾格爾墨斯就是胭脂紅酒。

囿於目前所佔據的史料，三種藥物的廬山真面及其之間的關係尚不能釐清。但

28 〈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為遵旨恭進西洋藥格爾墨斯摺〉，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2，頁302。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頁334。

30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江南總督邵穆布為代進西洋人貢物摺〉有同樣的記載：「江寧天主堂西洋人林安恭備葡萄酒十一瓶、鼻煙一瓶，並以西洋圖記加封送來。」見《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614。

31 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頁227。

32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113。

綜觀康熙時期的各種文獻和檔案，不難判定董先生的這種結論與康熙時期的記載有抵牾之處。主要涉及到如下兩點：

首先，關於胭脂紅酒的炮製。董先生認為，胭脂紅酒是用一種生活在櫟樹上色如紅胭脂的小蟲炮製的。而巴多明致法蘭西科學院諸位先生的信中卻傳達了另外的訊息。信中寫道，因為來自里昂的胭脂紅酒完全治好了康熙皇帝的心悸症，所以，他認為宮裡也可以像歐洲那樣配製胭脂紅酒。為此，「派人在整個韃靼地區及中國各省尋找胭脂蟲櫟樹，……人們全力以赴滿足這位君主，可是不管怎麼找都找不到。從四面八方送來的各種結紅果子的小灌木都不是胭脂蟲櫟樹。」³³可見，尋找胭脂蟲櫟樹的眾人，被灌輸的胭脂蟲櫟樹的兩大特徵：一是小灌木，其二，也是重要的一點，這種灌木結有紅果子。這種紅果子應該正是康熙皇帝所期盼的藥材。由此推測，胭脂紅酒理應是用櫟樹上的紅色果實炮製的。

其次，阿爾格爾墨斯和胭脂紅酒的關係。董先生在阿爾格爾墨斯和胭脂紅酒之間劃了等號，認定二者是同一種藥。對此問題的探討仍然離不開前述的巴多明的那封信。信中介紹了胭脂紅酒的相關情形，證明康熙時期巴多明對胭脂紅酒已不陌生。巧合的是，雍正四年（1726）二月初四日，巴多明、羅懷中（Jean-Joseph da Coast, 1679-1747）奉命認看宮中一批西洋物品，二人辨識出其中有三玻璃瓶藥是阿爾格爾墨斯。³⁴如果阿爾格爾墨斯和胭脂紅酒是同一種藥，巴多明理應告知內務府，這種西洋藥的藥名為胭脂紅酒，而不是阿爾格爾墨斯。正因此，依據上述推論，暫不能認定二者是同一種藥。

需要說明的是，清宮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已經製成治療心跳驚悸的藥。³⁵可能是療效不佳，所以才轉而尋覓格而墨斯和阿爾格而墨斯。

在治療康熙皇帝心悸症的過程中，傳教士用藥穩定了康熙皇帝的病情，隨之又建議他飲用產自加那利（Canarie）群島的葡萄酒。³⁶康熙皇帝飲用後，「甚覺有益，飲膳亦加。」³⁷葡萄酒在康熙帝康復過程中起了輔助治療作用。為此，康熙四十八年通過內務府的趙昌向兩廣、閩浙、江西等地督撫下達了同樣的指令：「以

33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Ⅱ》，頁313。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頁333。

35 陳可冀主編，《清宮醫案研究》，頁3。

36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Ⅱ》，頁37。

37 黃伯祿，《正教奉褒》，頁129。

後凡本處西洋人所進皇上上用物件並啟奏的書字，即速著妥當家人雇包程騾子星夜送來，不可誤了時刻。」同時，特意提出所進的物件，有西洋圖書花押者方許進呈。³⁸ 儘管只籠統說是上用物件，但從現存的奏摺看，在這段時間裡上用物件的內涵似乎陡然縮小，只是特指西洋葡萄酒和西洋藥物了。

傳教士較多的廣東、福建、江西、江蘇等幾省的封疆大吏接旨後分頭尋覓，幾個月後，就收穫頗豐。江西巡撫郎廷極奏稱，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二十六日，殷弘緒（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2-1741）送到西洋葡萄酒六十六瓶、哈爾各斯默一瓶。³⁹ 郎廷極的行動並沒有就此結束，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又奏報搜尋到更多的葡萄酒和西洋藥。分別是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5）所進的格爾默斯一瓶、洋酒四瓶；傅聖澤（P. 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3-1739 或 1740）進洋酒八瓶；沙守信（Émeric de Chavagnac, 1670-1717）進洋酒六瓶；馮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進洋酒六瓶；畢安進洋酒二瓶、德利亞爾噶一盒；穆泰來進洋酒二瓶。⁴⁰ 同一天，兩廣總督趙弘燦也把他的收穫向康熙皇帝作了彙報：「穆德我等交到酒壹箱，洋烟壹箱；畢登庸（P. Antioio da Costa, 1666-1747 以後）交到酒壹箱；景明亮交到酒壹箱、藥壹瓶。」⁴¹ 甚至被囚禁在澳門的羅馬教廷特使多羅「聞皇上利用真葡萄酒，特托人采覓寄來」，共計「加納列國葡萄酒一箱，七十小瓶；伯爾西亞國葡萄酒二箱，共二十大圓瓶；波爾圖噶國葡萄酒二箱，共二十四方瓶。」但這些葡萄酒還未來得及呈送給皇帝，康熙四十九年（1710）五月十二日多羅就辭世了。兩廣總督趙弘燦不敢貿然齎送，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十四日特具摺請示。康熙硃批：「隨便帶來。」⁴²

38 分別見〈兩廣總督趙弘燦奏請聖安並遵旨恭進西洋煙酒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閩浙總督梁鼎泰為遵旨恭進洋酒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江西巡撫郎廷極奏進西洋人殷弘緒所進物品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二日。以上奏摺收錄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2，頁380；頁365；頁334。

39 〈江西巡撫郎廷極奏進西洋人殷弘緒所進物品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二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2，頁334-335。

40 〈江西巡撫郎廷極奏進西洋物件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2，頁385-386。

41 〈兩廣總督趙弘燦奏請聖安並遵旨恭進西洋烟酒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2，頁381。

42 〈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報接到西洋來信及寄來洋酒事摺〉，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十四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3，頁6。

（五）清宮配製

倘若把清宮西洋藥物的來源分為外源性和內源性的話，以上幾種途徑進入宮廷的藥物，應當劃歸外源性範疇。內源性來源是指傳教士在清宮配製的西洋藥物。清宮配製西洋藥物的情況，在〈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討論，此不贅述。

二、西洋藥物的收貯

就目前佔有的史料而言，試圖全面再現康熙時期清宮收貯西洋藥物的狀況顯然是不現實的。既然如此，不妨退而求其次，依據現有的史料，以武英殿露房⁴³這個當時西洋藥物最主要的收藏地之一為考察對象，試舉管窺，以徵全體。

反映武英殿露房收藏情況最直接的證據，應是類似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十一日為乾清宮所立的《續入庫貯陳設油露藥材等項檔案》這樣的宮中庫貯、陳設檔案，遺憾地是，這些檔案已無從尋覓，好在多種清人筆記中的記述，幫助我們呈現康熙時期宮中收藏西洋藥物之大觀。

先看姚元之（1773-1852）《竹葉亭雜記》中的記載：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驚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⁴⁴

43 「武英殿露房」是後人對康熙時期宮中存貯西洋藥物之場所露房的稱謂。如，《寒秀草堂筆記》載：「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因修理武英殿露房，進呈宮中所藏，頒賞內廷大臣。」見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卷三，載《咫進齋叢書》。康熙時期的檔案中稱之為「蒸露房」。如，康熙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宮中供職的德國傳教士紀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身體不適，他看到西洋書裡講螃蟹石能對症治病，而螃蟹石「外尋不得，內蒸爐房有」。於是請求康熙帝賞給二兩螃蟹石。經查，「蒸爐房存有螃蟹石八兩六錢。」康熙帝大方地說：「石蟹乃何好物？不僅二兩，十兩亦易，照用數賜。乾清宮亦有，暢春園亦有。」見康熙五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李國屏奏西洋人吉利安請求賞藥摺〉，《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307。「內蒸爐房」是由滿文翻譯而來，是指位於大內的蒸爐房。考慮到其與宮中存儲西洋藥物的另一宮殿乾清宮相提並論這一事實，認定其應為「內蒸露房」之異寫，簡稱「露房」。露房在康熙六十一年歸武英殿管轄。見托津等編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八百八十六，頁6557。

44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頁21。

這段文字傳達出這樣的訊息：露房在武英殿東稍間，是以前存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地。甲戌夏，也就是嘉慶十九年（1814）夏，對武英殿露房進行了檢查。其內收貯有不少盛放在瓶中的丁香油、荳蔻油、肉桂油等。因年代久遠，油露已凝結成堅硬的膏體。藥膏有德力雅噶等。動物類藥材有：各種動物寶、蛇牙等。對於這些藥的去向，文中也作了交代，嘉慶皇帝把部分藥物賞賜給大臣，其餘的交給清宮造辦處。這條材料雖然透露了武英殿露房收貯有以前的西洋藥物，但從中無法獲悉這些藥物的準確年代，只能從「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動」判斷，藥物進入宮中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

留意嘉慶朝以西洋藥物賞賜大臣一事的不只有姚元之一人，吳振棫的《養吉齋叢錄》中也有類似記載：

嘉慶間以西洋貢藥賜軍機大臣。有所謂噶几牙油、容几拉油、郭巴益巴油、白爾噶木德油、桂皮油，貯玻璃瓶，油色備五；有所謂德里雅噶，貯錫盒。達末利地，貯磁盒。皆黝色如膏；有所謂色噶謀牛、蛇木、若木，⁴⁵貯木盒。皆康熙間貢入者，年久未詳其用。⁴⁶

這則筆記的價值在於：第一，清晰地透露出這些藥物都是康熙年間進貢到宮中，且年代久遠已不知用法。第二，在《竹葉亭雜記》所羅列的藥物之外，又增加了新藥物，如油露類的噶幾牙油、容幾拉油等，以及植物藥蛇木、苦木。但是文中未提及賞賜大臣的藥物原藏宮中何處。

假如單獨審視姚元之和吳振棫的記載，兩則文獻中都有無法解答的疑惑。而二者相互參照，眼前就會豁然開朗。《竹葉亭雜記》中西洋藥物的年代問題，在《養吉齋叢錄》裡一目了然：「皆康熙間貢入者」。而從《養吉齋叢錄》中無法得知的藥物收貯地點，可以在《竹葉亭雜記》裡找到答案。

姚元之和吳振棫的記述勾勒出武英殿露房收藏西洋藥物的輪廓，從中不難看出當時宮中西洋藥物的基本類別。至於數量則所記有限，好在《寒秀草堂筆記》可彌補這個缺憾。當時受賞賜的諸大臣中便有戶部侍郎姚文田（1758-1827），其子姚衡把蒙賜的藥品收錄在《寒秀草堂筆記》中。與姚元之和吳振棫更多地從獵奇角度描述不同，作為親歷者，姚衡對各種藥物的數量、盛放藥物的器皿、功效都一一作了

45 根據當時蒙賜大臣之一姚文田所收到的藥物來判斷，「若木」應為「苦木」之誤。苦木治諸瘡腫毒，岔氣痛。見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卷三，頁66。

46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四，頁268。

注明，有的還說明了用法。比如：

肉荳蔻油，二斤四兩，一匣，治筋骨疼，怕冷，塗搽。肉荳蔻花油，二兩五錢，二玻璃瓶，能補脾胃順氣，保心化痰。白荳蔻油，五錢，一玻璃瓶，能暖脾胃，去食水，下小水。蜜蠟金油，八兩四分三釐，三玻璃瓶；蜜蠟油，四兩九錢七分五釐，三玻璃瓶。以上二種治頭迷，痰火病。……都爾們底那油，十六斤八兩二錢，三十一玻璃瓶，外又一瓶，治小水不通兼內疼痛。郭巴益巴油，三十斤九兩九錢，三十二玻璃瓶，一磁瓶，一錫合〔盒〕，治刀傷。……德里雅噶，一百六斤十五兩三錢，二磁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錫合〔盒〕，治惡毒冷氣，腹內掙痛，脾胃虛弱。牙卜都牙，十一兩六錢，一匣，治諸瘡腫毒，全〔盆〕氣痛。色噶謀牛，十兩五錢，一匣；兀思噶末牙，五兩，一匣。以上二種，治瀉肚，去食氣，化痰。……獅子寶十五個，內破的一個，一合〔盒〕，治婦人難產，經水不調，研水服。牛寶四個，一匣。野豬寶一個，一匣。馬寶一個，一匣。以上三種治痢疾，研水服。⁴⁷

僅賜給姚文田一人的就有一百二十二種，宮中原存數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

三、西洋藥物的使用

康熙時期西洋藥物在清宮中有著廣泛應用。這種廣泛性主要表現在使用人群的寬泛，皇帝、皇子、皇親天潢、文武官員，乃至扈從出行的隨侍人員都有使用西洋藥物的記載，詳見表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罹患瘧疾，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和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神父的藥粉救了他的命，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和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神父帶給他的金雞納霜讓他退了燒。⁴⁸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突發心悸病，胭脂紅酒、格而墨斯、阿爾格而墨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⁴⁹ 雖然與西藥接觸之初，康熙持一種開放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康熙無所顧忌，對未曾使用過的藥物反復試驗便可證明這點。比如，對法國傳教士所帶的救其性命於倒懸的法國國王分發給全國窮

47 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卷三，頁 59-61、68-69。

48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I》，頁 290。

49 詳細闡述參見關雪玲，〈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頁 99-111。

人的藥粉，傳教士雖然告訴了他這些藥粉在法國治癒的所有疾病，他仍再三驗證，看到這些藥粉的療效果真神奇、迅速，一個個奄奄一息、只等一死的人在服藥後第二天就脫離了危險。證實藥物療效後的康熙帝絲毫不吝嗇讚譽之詞，他把這些具有神奇療效的藥粉稱為神藥。⁵⁰ 對金雞納同樣如此，在服用之前，從民間找來幾位病人和索額圖（1636？-1703）、明珠（1634-1708）等四位重臣先後陸續試嘗，看到患病的很快痊癒，無病的安然無恙，未出現任何異常反應，他才喝下了金雞納。⁵¹ 一旦確認藥物是安全、有效的，他則積極予以推廣。正如他的一段訓諭：「諸藥之性人何由知之？皆古聖人之所指示者也。是故，朕凡所試之藥與治人病癒之方，必曉諭廣眾或各處……惟冀有益於多人也。」⁵²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康熙皇帝時常降旨明示使用西洋藥。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十三日，皇七子胤祐（1680-1730）有恙，康熙讓其先服用十天如勒白爾拉都。十天後並未痊癒，康熙讓其繼續服用二十天。十天後，胤祐把恢復情況向父皇奏聞：「我服此藥，日覺見好，身體較前奏又強些，氣力漸壯，頭痛全好。」⁵³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二十日，都統索奈腹瀉不止，服用御醫所開之藥，病未見輕。康熙看到奏報後詢問：「已命服德里雅噶乎？」⁵⁴

康熙皇帝的個人意志決定了西藥在清宮中的存在是一種必然。這種背景下，太醫院御醫別無選擇，只能遵從康熙的指令用西藥給病人療疾。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初八日，太醫院御醫吉邵奉旨給皇長子胤禔嬖嬖之父關保看病，康熙賜給西洋藥令其服用，為此，吉紹去東藥房預備。⁵⁵ 也許御醫最初使用西藥只是奉命行事，然而檔案表明，後來御醫的應對是積極的。御醫根據患者病情或單獨使用西洋藥，或中西兩種藥物結合使用。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二十六日，保壽阿哥頭迷身軟，食欲不佳，有時胃脇疼痛，嘔吐氣短，御醫奉命診察後，陸續使用德里雅噶、如勒白爾拉都兩種西藥。⁵⁶ 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大學士張玉書（1642-

50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I》，頁 288。

51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I》，頁 289-290。

52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頁 638。

53 〈胤祉等奏報七阿哥病勢摺〉，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425。

54 〈胤祉等奏都統索奈病情摺〉，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817。

55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大連市圖書館文獻研究室、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譯編，《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頁 109。

56 〈胤祉等奏報陰雨情形並保壽阿哥病勢摺〉，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371。

1711) 因濕熱氣滯傷脾之症，御醫給其服用德里鴉噶及滲濕和中湯。⁵⁷

各種途徑進到宮中的西洋藥物尚屬珍稀之物，加之掌握製藥技術的傳教士基本都在宮中供職，可以說，大多數西洋藥作為聖藥壟斷在皇帝手中，御醫施治時要向皇帝討用。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十二日，金廷紹奉命前去診視鑲黃旗二等侍衛井四勒病。井四勒原系傷寒發黃之症，耽延七日才請大夫治療，導致毒勢甚盛，癰疹不透，嘔吐泄瀉。金廷紹給其服用兩付德里鴉噶後，惟有癰疹漸透，諸症仍前，而逆泄瀉甚頻。後又兩次討用德里鴉噶兼用加減茵陳五苓湯、加減茵陳退黃湯調治。⁵⁸ 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多羅信郡王鄂扎下痢紫紅血水，御醫商議討用西白噶瓜那。⁵⁹

民間一向視清宮中的醫方、藥物為尚方珍藥。官員們雖心嚮往之，但不敢輕易開口。康熙四十四年南巡時，康熙以宮中自製的金雞納賞賜幾次患瘧疾的江南提督張雲翼。賞賜之前，君臣之間有這樣一番對話：「皇上說：我有很好的藥，你怎麼不討呢？回奏：皇上沒有賜，不敢擅討。上說：你不比別人，不同著，要什麼只管討。」⁶⁰ 對話中兩個人的心態表露無疑。就張雲翼而言，向皇上請要御用藥物需要很大的勇氣，即便屢次罹患瘧疾，也沒有膽量討要藥品；就康熙帝而言，並非有求必應，賞賜藥品是親疏有別的。

相反，在戰時和戰備狀態下，對軍中將士相當慷慨。康熙三十五年冬，在親征噶爾丹期間，黑龍江將軍薩布素（1629-1701）病在軍中，康熙將隨身攜帶的如勒白白爾拉都全部賜予他。數日後，自京城而來的梅勒章京巴林甚為虛弱，康熙擬賜給其如勒白白爾拉都時，藥不敷使用。於是，他叮囑太子，將宮中的如勒白白爾拉都全部送給巴林。⁶¹ 康熙五十七年底，胤禩（1688-1755）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率部隊開往前線。康熙曾賜給進兵人等數萬丸保心石以備急用。對保心石一事康熙記掛在心，曾就保心石的療效詢問過，回饋意見是：「甚有裨益」。⁶² 康熙考慮到藥物

57 〈胤祉等奏報大學士張玉書病勢摺〉，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677-678。

58 〈胤祉奏報患病求醫人數摺〉，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321。

59 〈胤祉等奏明陰雨情形並報求醫人員摺〉，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431。

60 佚名，《聖祖五幸江南恭錄》，收於《振綺堂叢書初集》，頁 16。

61 〈皇太子胤初奏為各部所奏摺〉，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21。

62 〈康熙帝硃諭一紙〉，無年月，《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658。

可能行將告罄，又配製了二萬一千五百小丸保心石賞賜給胤禩。五十九年（1702）四月，藥品送抵胤禩軍營後，病患立即服用。這次同樣有比較好的療效，軍營中一人：「身患浮腫尚未愈，其服保心石三次，今甚覺好轉。」胤禩並未將保心石據為己有，而是將一部分轉贈給平逆將軍延信、額附阿保備用。⁶³

賞賜西洋藥物是一種經常性的行為，縱然是出巡途中也不例外。清宮曾在張誠、白晉的指導下製成乾燥劑、糖漿製劑、浸膏等，康熙帝降旨把這些藥物都留作御用藥物。且為了出行時便於攜帶，他又諭令用金銀製作旅行藥壺。康熙皇帝特別喜歡在旅途中把這些藥物恩賜給隨駕的皇子、朝廷王侯及侍從人員。當他得知哪個侍從患病時，就立刻委派御醫攜帶對該患者有特效的藥物前去醫治，不管這種藥物多麼貴重。⁶⁴

四、太醫院御醫與西洋大夫共同診視疾病

康熙朝的御醫隊伍是一個多元化的群體，其中既有太醫院御醫，又有西洋大夫、蒙古大夫、喇嘛大夫等。⁶⁵他們用自己所擅長的方法和手段，各顯身手，首先為皇室服務，保證皇帝身體康豫，而後被簡選派遣，作為皇帝恩澤廣被的實施者，給他人療疾。正是由於御醫的多種成分，使得康熙皇帝在調遣大夫時可以根據病情的需要，組織多方醫治。以下就太醫院御醫和西洋大夫共同診視疾病的情況作闡述。

在康熙皇帝的潛移默化下，皇子們對西洋醫學也相當信任。在康熙外出期間，召集西洋大夫與太醫院御醫共同診視疾病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下旬，蘇麻喇姑（？-1705）身患重病，腹內絞痛，便血，不思飲食。當時康熙皇帝正在塞外巡視，在京城綜理國事的皇三子胤祉（1677-1732）、皇八子胤禩（1681-1726）緊急召集西洋大夫羅德先（Bernard Bodes, 1645-1715）、喇嘛大夫及太醫院大夫劉聲芳、李穎滋、張懋功等共同出診。大夫們認為是脾虛內火盛之症，病情危重。康熙皇帝看過奏報後，指示皇子：「爾等細問大夫等，若可用西白噶瓜那，則

63 〈撫遠大將軍胤禎奏謝賞藥摺〉，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454。

64 白晉撰，趙晨譯，《康熙皇帝》，頁42。

65 關於康熙朝的御醫的情況，詳見關雪玲，〈康熙朝御醫考述〉，《明清論叢》，第七輯，頁346-361。

朕賜祖母一種草根，用以熬雞湯給祖母飲，若大夫不肯則罷。西洋大夫若欲用山葫蘆，則向赫世亨取而用之。」聞知康熙皇帝的旨意後，羅德先否決了康熙帝用西白噶瓜那的提議。認為用西白噶瓜那雖治病疾，但不可用於年老體弱及虛弱之人者。至於山葫蘆藥方，羅德先看後認為，山葫蘆等是瀉藥，不宜使用。⁶⁶

以上是外科大夫羅德先和太醫院御醫等共同治療內科疾病的情況。事實上，羅德先以及在宮中供職的西洋醫生，像鮑仲義（Joseph Baudino, 1657-1718）、何多敏（Jean Dominique Paramino, 1661-1713）、樊繼訓（Pierre Frapperie, 1664-1703）、羅懷中、安泰（Etienne Rousset, 1689-1758）等耶穌會士，羅馬教廷傳信部的加里亞迪（Gagliardi）、俄羅斯察罕汗派遣的噶爾芬（Thomas Garwin, 1715-1717 年供職宮中）等，均以外科見長。⁶⁷ 正如洪若翰 1704 年 1 月 15 日的信箋所言，他們擅長治癒傷口，皇帝派他們給宮中的官員以及在京的地位最顯赫的人治療。皇帝對這幾位神父的醫術相當滿意，「以至於他若去韃靼與帝國的各省巡遊時，總是把幾位神父中的某一位帶在身邊。」⁶⁸ 康熙四十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康熙皇帝西巡西安期間，扈從的便有西洋醫生。十一月，聖駕回鑾時，川陝總督華顯（1659-1703）因生瘡，請求賜醫醫治。康熙帝令隨扈的太醫院外科大夫祁嘉釗與西洋大夫留在華顯處治傷。西洋大夫與祁嘉釗共議調治後，華顯病情好轉，但瘡口依然頗深，毒素未減，精氣甚弱。華顯問西洋大夫有無其他治法，西洋大夫答覆，除現用藥外，別無他法。轉而向祁嘉釗求助時，祁嘉釗認為自有辦法，但因是與西洋大夫共同醫治，不便擅自處置。康熙帝聞知這種情況，降旨讓祁嘉釗消除顧慮，速加調治。⁶⁹ 華顯的瘡口最終不但沒有治癒，而且雪上加霜，又得了腹瀉，不久便撒手人寰。⁷⁰ 康熙四十四年七月，治療陳秉恒的搭背瘡是中西醫生合作的又一例。先是外科大夫孫之鼎診治，療效甚微。康熙皇帝斥責孫之鼎後，又加派西洋大夫一同治療，孫之鼎對此表明態度：「皇上所知甚是，奴才懼愧不已。奴才等欲與西洋大夫商議，盡力勤治。」⁷¹

66 〈胤祉等奏報醫治蘇瑪拉祖母病情形摺〉，康熙五十年九月初四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744。

67 西洋大夫的醫蹟，詳見關雪玲，〈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頁 99-111。

68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I》，頁 309。

69 〈川陝總督華顯奏謝賜醫治病摺〉，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303。

70 〈川陝總督華顯奏報病重摺〉，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305。

71 〈胤祉等奏報收糧陰雨情形並官員病勢摺〉，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380。

上述列舉的三個事例均出自於滿文奏摺，仔細審讀後，有這樣的感受：西洋大夫與太醫院御醫在治療過程中維持表面的平衡，而且懾於皇帝的權威，太醫院御醫並不冒犯西洋大夫。治療華顯時，先用了雙方都認可的方法，華顯請求進一步治療後，西洋大夫聲明沒有更好的方法。祁嘉釗雖有自己的治療預案，但考慮到是奉命與西洋大夫共同醫治，為了避免摩擦，沒有擅自施治。直到康熙帝降旨，他才處置華顯的瘡口。陳秉恒一例中，孫之鼎對西洋大夫的加入則表示，意欲與其商討治療方法。西洋大夫與太醫院御醫在治療過程中相處問題，表面看是個體之間的人際關係問題，實則是中醫和西醫兩種不同背景文化的碰撞問題，畢竟各自的醫學理念、診斷方式、治療手段不同。對於西洋大夫與太醫院御醫來說，都面臨著是否接受異質文化的問題。對兩種文化物質層面上的中藥和西藥，雙方並不排斥，中醫使用西藥和西醫使用中藥的記載見諸史料。但這畢竟不是一種常態，也不意味著雙方對各自的認同。只是奉命執行同一差事的雙方懾於皇帝的權威，彼此調整相處之道，達到一種表面的平衡。

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現在無法得知太醫院醫官的心理感受，而西洋傳教士的信笈為我們洞悉他們的內心世界打開了方便之門。巴多明在追憶著名的羅德先大夫時，借清宮官員之口說出了中國醫生對西洋大夫的看法，以及西洋大夫與中國醫生的區別，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正是傳教士眼中中外醫生之間的區別。巴多明信笈中描述，皇帝把他關心的好幾名病人託付給羅德先，因為中國醫生未能治好他們的疾病。負責向皇帝彙報羅德先治療方法的官員不久就拋棄了幾乎所有中國人對外國醫生抱有的偏見，中國醫生們則竭力維護這種偏見。宮廷官員們常對巴多明說：

這位歐洲大夫與我國的醫生們是多麼不同！後者會無所顧忌地說謊，同時不顧病人巨大危險，遇到不懂的疾病，也會不懂裝懂亂開藥方。如病家對藥方表示懷疑，他們就會說一通我們聽不懂的粗野的話。總之，他們只會挖空心思從病人口袋裡撈錢，然後就把他送入墳墓。相反，這位歐洲大夫話語不多，很少許諾，卻實實在在辦事。如果他說不必擔心，我們就完全放心，因為他是不會弄錯的；如果他難以回答我們，或者他愁眉苦臉，那便是病人死兆了。⁷²

一言以蔽之，傳教士認為西洋大夫與中國醫生最大的差異在醫德方面。中國醫生是否真的不堪到如此程度尚待商榷。而大多數西洋大夫在診視過程中，的確是

72 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I》，頁132。

如實陳述病情，從不阿諛逢迎皇帝，隱瞞患者。例如，醫治蘇麻喇姑時，康熙皇帝提議用西白噶瓜那、山葫蘆，羅德先根據患者身體狀況認定藥不對症，因此不予使用。針對華顯的病勢，西洋大夫明確表態，除現在使用的藥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以至於招致康熙皇帝的埋怨：「西洋大夫不堪用，朕甚著急。」⁷³義大利籍傳教士何多敏甚至因為直言皇十八子胤祚（1701-1708）病入膏肓而招致屈辱。康熙四十七年八月，皇十八子胤祚跟隨父皇去塞外。不料途中患了急病，腮部腫大，高燒不退。康熙皇帝心急如焚，緊急召宣外科大夫孫之鼎、祁嘉釗外，又降旨給在京留守的皇三子胤祉等，讓他們派出外科大夫媽媽何氏等人日夜兼程前往。何氏到後，胤祚的病情一度出現轉機。⁷⁴至於何氏如何醫治檔案中語焉不詳，只知道的是，她所攜帶的治牙疳的八寶散不敷使用。康熙帝諭令將何氏家的八寶散多裝些，由驛站馳遞前來，不得有絲毫延誤。⁷⁵不料，九月初二日晨胤祚的病情出現了反復，病勢甚重，⁷⁶初四在回京途中離世。在此期間，隨扈出行的何多敏曾奉命診視胤祚的病情，確診其病情太重已無力回天，不料這與討好皇帝的御醫們的診斷恰恰相反，何多敏因此遭到太監粗魯對待，挨了一耳光。⁷⁷

結 語

歷數康熙時期清宮中的西洋藥物，金雞納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從中西醫學交流史角度而言，金雞納以顯著的療效挽救康熙皇帝性命於倒懸，為西洋藥物贏得信任，為西洋醫學在宮中的傳播找到了良好的契機。從宗教史角度而言，進呈金雞納的法國耶穌會士，因此而獲得居所和可用於建造教堂的空地。從此，法國耶穌會士在京城有了自己單獨的住所和根據地，金雞納在法國耶穌會的燕京開教史上充當了重要角色。

此外，金雞納的代表性還體現在金雞納的進宮途徑和清宮對於金雞納的使用，可視為所有西洋藥物在這兩方面的縮影。自從治癒康熙皇帝的瘧疾後，金雞納就時

73 〈川陝總督華顯奏謝賜醫治病摺〉，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303。

74 〈胤祉等奏報派大夫往醫十八阿哥病摺〉，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597。

75 〈內務府總管普奏進八寶散藥摺〉，無年月，《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543。

76 〈胤祉等奏為得知十八阿哥病稍愈摺〉，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600。

77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各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頁342。

常通過前述的幾種外源性和內源性途徑彙集宮中。宮中的金雞納除用來療疾外，還被康熙帝作為聖藥賞賜給臣工，進而得到更大範圍的傳播。從金雞納在清宮中的境遇，可以清晰地看出，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主要是以康熙皇帝為中心來進行的，康熙帝由西洋藥物的受益者，變為倡導者，康熙帝的個人意志和需求有力地影響著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同時，應該看到，清宮西洋藥物和中藥的來源不同，後者被列入國用，有「各直省歲解藥材本色並折色錢糧」等制度進行保障。而西洋藥物的來源沒有常態機制作保證，隨意性較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雖然康熙時期西洋藥物在清宮中有著廣泛應用，但終究不是主流。

太醫院御醫和西洋大夫是康熙朝御醫隊伍中的主要力量，他們時常奉命共同診視疾病。在診視過程中，雙方懾於皇帝的權威，彼此調整相處之道，達到一種表面的平衡。然而，各自不同的醫學理念、診斷方式、治療手段，決定了不同醫學體系間在更為本質、更高層次上的交流無法實現。

〔後記〕

本文部分內容，曾在 2011 年 10 月舉辦的《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上口頭報告，特此申明。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見，文章根據審稿人的意見做出了修改和補充。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 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 王士禛撰，湛之點校，《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清) 王原祁、王奕清等奉敕撰，《萬壽盛典初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3-6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 清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 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65-70 輯，1993。
- (清) 不著撰人，《聖祖五幸江南恭錄》，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叢書集成續編》，景振綺堂叢書本。
- (清) 吳振棫著，《養吉齋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清) 姚元之撰，《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 姚衡撰，《寒秀草堂筆記》，《咫進齋叢書》光緒九年（1883），歸安姚氏校刊本，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14 冊。
- (清) 崑岡等編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續修四庫全書》，第 798-81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 黃伯祿撰，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 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 蕭爽撰，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二、近代論著

- 白晉 (Joachim Bouvet) 撰，趙晨譯，《康熙皇帝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杜赫德 (Du Halde, Jean-Baptiste) 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 Chine*)》，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 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
- 馬國賢 (Matteo Ripa)，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陳可冀主編，《清宮醫案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
-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 (1579-1732)》，北京：中華書局，2006。
-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大連市圖書館文獻研究室、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譯編，《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龍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 關雪玲，〈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頁99-111、159。
- 關雪玲，〈康熙朝御醫考述〉，收於《明清論叢》，第七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346-361。

A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Spreading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into the Qing Court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Emperor

Guan Xueling
Palace Department
The Palace Museum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Emperor, The influences of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in China reached a climax, which was known a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a”. The number of the European physicians and the range of the use of medicine which were brought into the Qing court by the missionaries were considerably enormous. This thesis intends to outline the landscape of the spreading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series of demonstrations. The discussion includes two aspects:

1. Give to the origin, the storage and the using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Qing court, the spreading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medicine seemed to be centralized by Kangxi Emperor himself who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advocator from a beneficiary. Kangxi Emperor’s personal demand and powerful will influenced the spread of European medicine among the Qing court positively.
2. The European physicians often served the Emperor together with imperial physicians. Apparently, these two groups always shared the same conclusions for the condition of the Emperor, because there were lots stresses both professional and political.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in ideology, diagnoses and disease treatments made it hardly possible that essenti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systems on high levels were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Keywords: Kangxi Emperor, Western medicine, European Physician

表一 西洋藥物使用一覽表

序號	時間	患者或者使用者	使用藥物	史料出處
1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	康熙帝玄燁	藥粉、金雞納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頁290
2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初八日（1692年10月17日）	康熙妻弟		《張誠日記》，頁225
3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	黑龍江將軍薩布素	如勒白白爾拉都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21
4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	梅勒章京巴林	如勒白白爾拉都	同上
5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	第巴桑吉嘉措處畫佛像之工匠	西洋油膏	同上，頁144
6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	皇長子胤禔嬪嬙之父關係		《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頁109
7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	鑲黃旗二等侍衛井四勒	德里鴉嘴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321
8	康熙四十四年	江南提督張雲翼	金雞納	《聖祖五幸江南恭錄》
9	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保壽阿哥	德里鴉嘴、如勒白白爾拉都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371
10	康熙四十四年九月	皇八子胤禩	金雞納	同上，頁392
11	康熙四十五年六月	皇七子胤祐	如勒白白爾拉都	同上，頁425
12	康熙四十五年六月	多羅信郡王鄂扎	西白嘴瓜那	同上，頁431
13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	皇八子胤禩	德里鴉嘴	同上，頁465
14	康熙四十六年四月	喀爾喀車臣汗烏墨克依	如勒白白爾拉都、銅綠露	同上，頁502
15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	康熙帝玄燁	格而墨斯、阿爾格而墨斯、胭脂紅酒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2冊，頁299-300；《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I》，頁37
16	康熙四十九年五月	廣儲司員外郎華色	德里鴉嘴、巴西裏岡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677
17	康熙四十九年五月	大學士張玉書	德里鴉嘴	同上
18	康熙四十九年六月	理藩院右侍郎薦良	德里鴉嘴	同上，頁687
19	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	內大臣頗爾盆	巴西裏岡	同上，頁702
20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	江甯織造曹寅	金雞納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4冊，頁326
21	康熙五十七年	胤禔所率軍營將士	保心石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658
22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	胤禔所率軍營將士、平逆將軍延信、額附阿保	保心石	同上